

幻象和複製的世界

● 范捷平 徐 艷

Günther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1988).

過時的人

安德斯的《過時的人》探討了現代人在工業文明中的困境，並在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人類終將被自己創造的產品和機器毀滅的悲觀主義本體論。

德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是本世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技術批判哲學不僅探討了現代科技和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的後果，而且最早在哲學的層面上對電視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安德斯的代表作為《過時的人》(*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他在這部哲學巨作中探討了現代人在工業文明中的困境，並在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人類終將被自己創造的產品和機器毀滅的悲觀主義本體論。

《過時的人》分上下兩卷，上卷副標題為「論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人的靈魂」(Über die Seele im Zeitalter 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下卷為「論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生活的毀滅」(Über die Zerstö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幻象和複製的世界〉是安德斯對電視的現象學研究，在上卷中佔極重要的地位。《過時的人》在1956年問世，至今已有39年，其間多次重印並被譯成多國文字。當年，安德斯根據人類三項最新的科技成果：電腦、電視、原子彈提出三個命題。第一，創造者與創造物的顛倒。在工業文明時期機器的創造者走向創造的反面。人類所創造的產品不僅使人物化，而且還在質量上超過了物化了的人。安德斯把人在面對自己的產品(如電腦)時的自愧弗如稱為「普羅米修斯的羞愧」；第二，核子武器的產生使人類第一次擁有毀滅世界的的能力，它意味着人類已無法駕馭自己的產品，並代表了一種絕對的虛無主義，在本質上徹底否定了人類所創造的文明；第三，即本文介紹的幻象和複製的世界。電視將世界以

圖像的形式運進家門，幻象以真實的面目取代了真實的世界。

安德斯在《過時的人》第五版前言中認為：當年的最新科技成就今天也許已經過時，但《過時的人》中提出的觀點不僅沒有因此而顯得陳舊，相反地，卻更加印證了它的真實。時至二十世紀末，現代傳播媒介技術日新月異，本文着重回顧安德斯在近40年前提出的媒介批判理論，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迪。

電視圖像的雙重性

為甚麼說我們的世界成了幻象世界呢？安德斯在〈幻象和複製的世界〉中對這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安德斯認為，由電視圖像傳送的「真實」，其本質在於這些圖像在本體論意上具有雙重性。也就是說，電視圖像不屬於我們通常認為的本體存在範疇，它既非假象，也非真實：既不是觀照，也不是現實。通過電視播放的事件，即使是現場實況轉播，同樣既不具備純觀照的特性，也不是藝術作品中的虛構真實，而是在客廳或臥室裏收看電視這一事件本身。人們在收看事件時既是「出席」，同時又是「缺席」的。安德斯將電視圖像本質的這一本體論上的雙重性定義為「幻象」，其實質是一種無法確定，一種亦幻亦真，甚至是一種弄假成真。在安德斯看來，「幻象無非是事物表現自己的一種形式」^①，而現代通訊、信息技術恰恰為這個世界製造其本身的幻象創造了最好的條件。一方面，人在經歷這個幻象世界時無法

與之對話；另一方面，這個世界無視人的存在卻每時每刻在和人說話。而這種單向度的對話並不因為受騙者的認同而變得真實，因為謊言的核心就是要尋找接受。

所謂幻象世界的本體論命題碰到最敏感的問題便是電視新聞，因為今天大多數人幾乎都只是通過電視屏幕認識並「缺席」地參與這個世界的，所以安德斯在這一問題上持激進的觀點。他認為電視新聞的本質並不在於電視新聞所蘊含的事實本身，而在於它對這些事實所進行的評判和傾向性。攝像機鏡頭的取捨、拍攝的角度、片子剪輯及製作本身就含有很強的主觀性。安德斯說：「電視新聞並不因為它首先是評判，因而具有雙重性，而是因為它是電視新聞，評判才具有雙重性。」^②安德斯試圖以此來闡明電視新聞內在的本質：電視新聞賴以生存的前提便是吸引電視觀眾收看，因而新聞必定是有傾向性的，它不可能反映真實的世界和事件。此外，電視新聞的後果也具有雙重性：一方面，電視新聞的傾向性和評判性意味着新聞本身對被報導的對象已進行了一種先入為主、潛移默化式的加工，觀眾往往在無意識中被剝奪了判斷的需要和能力；另一方面，新聞總是在某一事件具體的評判上強調某一點，往往只報導事物的一面，而不及其餘，根本不可能全面地、多維地反映事物的全貌，因而新聞提供的世界不可能是真實的。

與西方的其他媒介哲學相比，安德斯的學說更激進，也更深刻。那是因為他對電視的反思着眼於現

安德斯認為電視新聞的本質並不在於所蘊含的事實本身，而在於它對這些事實所進行的評判和傾向性。這意味着新聞本身對被報導的對象已進行了一種先入為主、潛移默化式的加工，觀眾往往在無意識中被剝奪了判斷的需要和能力。

象學分析，也就是說，他通過電視普及所帶來的社會及人的靈魂變化來揭示電視的本質。從表面上看，安德斯與現代美國大眾媒介批判理論很相近，都對電視現象持批判態度，但實際上有很大區別。比如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雖然也對大眾媒介進行了入膚的分析批判，然而他最終還是回到「媒介等於信息」的出發點上^③，從而消解了其批判的積極內涵。同樣，安德斯的理論比當代美國媒介批判理論家珀斯曼(Neil Postman)也來得入木三分。在珀斯曼的主要著作《失去的童年》(*Das Verschwinden der Kindheit*)及《我們娛樂至死》(*Wir amüsieren uns zu Tode*)中，電視及其他文化工業手段導致兒童失去童年、成人失去判斷力的現象得到了深刻的揭示。然而珀斯曼的批判重點在現象本身。安德斯則沒有像麥克盧漢和珀斯曼那樣只停留在具體的某一現象上，從而揭示出電視作為整體的欺騙本質。他認為，只有把電視視為整體結構才能揭示其本質，才能看出其欺騙性，才能不至於被具體的、局部的所謂「真實」所蒙騙。他套用黑格爾的話說：「整體是個謊言，那才是整體。」^④這與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整體非是」(*Das Ganze ist das Unwahre*)的說法十分相似。如果說阿多諾這一觀點是他從黑格爾本體論中得出的悲觀主義歷史觀，那麼安德斯用黑格爾的那句名言則是為了指出電視謊言的一種物質基因。也許我們可以說，發現電視這個「飛來去器」的謊言效應是安德斯的一大功績，他看到將真實世界割裂

成支離破碎的圖像在電視屏幕上是如此「逼」真，使得假象以一種「真」的面目出現。其結果是，當謊言以「真」之面目出現時，謊言自身便具有斯賓諾莎意義上的「然即否」的辯證性^⑤。事實上，當電視裏非真的世界成為人們主觀意念中的世界之後，人對真實世界的認識能力便隨之喪失。

電視圖像的商品特徵

安德斯在指出電視圖像的幻象本質的同時，還揭示了電視圖像的商品特徵。他指出，無論是國家電視台還是私人電視台所提供的電視節目，從本質上講與商店櫥窗裏陳列的商品沒有區別，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螢光屏一亮，它就是自己的廣告，再加上電視為別的商品廣告，所以電視無愧為廣告之廣告。安德斯就此指出，電視播放甚麼節目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播放節目。後工業時期世界各國電視節目日益增強，其娛樂性的趨向恰恰證實了電視本身就是為自己做廣告的事實。

此外，安德斯指出，電視作為商品的另一特徵是與別的商品一樣無限止地製造人的消費慾望，舊的消費慾望一旦被填平，又會有新的商品出現，伴隨而來的便是新的需求。現代人並不是因為需要才佔有，而是佔有了才需要。他舉可口可樂為例，可口可樂作為商品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解渴，在很大的程度上可口可樂還製造「渴」，製造消費者對一種以前所沒有的、現在不

電視無限止地製造人的消費慾望。現代人並不是因為需要才佔有，而是佔有了才需要。可口可樂作為商品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解渴，可口可樂還製造消費者對以前所沒有的、現在不可缺少的可口可樂口感的「渴」望。



安德斯曾指出：「我們已被判處只能被動地接受幻象世界，而不能認知真實世界。」這句話揭示了影像時代的人類處境。

可缺少的可口可樂口感的「渴望」。電視的商品特徵就像可口可樂一樣，提供並包含了需求本身。電視節目的目的首先是為了製造人們的需求，然後再用更多更新的節目去刺激人們更大的需求。這便是商品消費和商品生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怪圈。

大眾隱居機

安德斯也許是第一個認識到電視不僅是製造幻象世界的一種媒介，而且更是製造特殊類型的人的機器。因此他稱電視機是「大眾隱

居機」(Masseneremiten)。「大眾隱居機」包含着兩個絕然對立的概念：如是大眾便無法隱居，隱居的人無可謂之大眾，電視機卻能將這一對立矛盾做到了完美的統一。電視觀眾一方面單獨地，或以家庭為單位消費圖像，他們參與世界的行為是彼此隔絕的；另一方面，他或他們和其他千百萬電視觀眾一起，同時消費同一個圖像。在電視機出現之前，人們坐在電影院裏消費電影圖像，那還是一種社會群體消費。而今，每個人在家中，甚至常常是獨自一人，帶着各取所需的良好感覺，看那在千家萬戶播放的內容。目的本身並沒有發生甚麼變化，但手段的改變，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

電視消費是一種荒誕的特殊形式的家庭工作即把我個體轉變成「大眾人」。現代人在花錢出賣自己的個性和自由。

隔絕。人們越是孤獨，便越是拚命試圖用電視來填充自己的生活。於是孤獨的人們在萬籟俱寂的夜晚，手裏捏着電視遙控器，無聊地從一個頻道換到另一個頻道，這竟成了現代人的生活常景。

安德斯據此得出結論，電視消費是一種荒誕的特殊形式的家庭工作。之所以稱為特殊形式的家庭工作，是因為在電視機旁，電視觀眾都在不懈地做一份工作：即把自我個體轉變成「大眾人」。德語中有一句俚語：吃甚麼樣的飯，做甚麼樣的人。如果把「吃」放在精神層面上來理解，那麼就意味着每個自我在消費大眾媒介產品的同時，也完成了由自我個體到「大眾人」的轉變。這份家庭工作的非同尋常是顯而易見的：過去人們辛勤地工作，以獲得低限度的消費和享受，而今人們最大限度地消費和享受，以產生「大眾人」。過去人們工作是為了報酬，現在人們則出錢購置「生產資料」，且不說檔次越來越高、功能越來越強的電視機，在許多國家，電視節目也是要錢的。現代人在花錢出賣自己的個性和自由。以前常有「憂天下」之士，批評某些不合理的教育體制有抹殺人的個性和理性的危險，時至今日，把參差不齊的個體一刀削平的工作已在家庭中、在電視機旁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但是電視消費這種家庭工作，撇開諸種弊端不談，是否能促進家庭的維繫力呢？眾所周知，西方的家庭破裂比比皆是，在亞洲也大有西風東漸的傾向。如電視的普及真能復興家庭，這倒不失為一件好事。但實際情況是電視消費不但沒

有穩固家庭，反而促其瓦解。表面上看，一家人圍坐在電視機前，其樂融融。而實際上，「外在的世界」，世界的幻象佔據了主導地位，四壁之內，家庭成員形同路人，失去交流，既沒有時間去交流，也沒有必要去交流。回想以前的客廳，且不說東方那種老人高堂，兒孫繞膝的情形，在西方，就說椅子的排列吧，大家至少是面對面坐的。而今家庭形如影院，家人只是觀眾而已。安德斯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電視機成了消極的家庭餐桌。電視機並沒有給家庭帶來共同的中心，而僅僅給家庭帶來了所謂共同的躲避點。

消解邏各斯

安德斯認為電視還讓人失去許多說話的機會。人們在電視機前的那份投入，哪裏還容人有閒心說廢話？！偶而交換隻言片語已屬十分難得。與其說人們沒有說話的機會，倒不如說人們在五彩繽紛的幻象世界面前專心致志，失去了說話的興趣。安德斯甚至驚呼：電視在悄悄地剝奪人類的語言能力。說話已不再是人們嘴裏吐出詞句，而是在等待、在接收、在聽。這樣看來，作為語言本質的邏各斯或許要重新定義。在海德格爾看來，邏各斯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裏儘管具有多層含義，但其基本含義則是言談，後世哲學對邏各斯的形形色色的闡釋，不斷掩蓋其言談的本真含義^⑥。在電視普及的今天，邏各斯的含義似乎不再是言談，而是

聽。那麼這對人的精神有甚麼影響呢？洪堡(Wilhelm von Humbolt)認為：人的思維活動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當人明確意識到某一客體與自身有所不同時，他就立即會發出一個指稱該客體的語聲。在人擁有的各種能力中，發聲最適合於表現他的內心感受，因為人所發出的聲音正如人的呼吸，充滿了生命力和激情⑦。由此觀之，把人的語言能力局限於「聽」，把人降格為「聽者」，那麼人的心靈之貧瘠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聽」多少有點俯首帖耳的意味，而在德文中，由「聽」轉變而來的形容詞hörig和名詞Höriger，在歷史上甚至有賣身為奴的含義。語言不僅是人交流的工具，更是人的精神表現。如果語言被取代了，那麼何以載道呢？

人類的幼稚化

在安德斯的〈幻象和複製的世界〉中，「運進家門的世界」一直是個十分重要的命題。在安德斯看來：電視將世界「運進家門」之後，電視觀眾和這個運進家門的世界之間失去了應該存在的距離。這個世界既遠在天邊，又近在眼前。人們似乎覺得可以「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然而這天下之事對人們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下事之奇，天下事之多，而人卻被隔絕在螢光屏之外張望，這在安德斯看來是十足的「窺淫」現象，人與他所在的世界之關係通過電視簡單化了、幼稚化了。而更為可悲的是，在電視將世界「運進家門」之後，人已不

再去尋找世界，而是世界向人走來。要知天下事，趕緊回家門。打開電視機，世界的「真實」就像自來水一樣源源不斷地流淌下來。只有關上門，遁入四壁，世界才向人敞開大門。世界以高速度、高密度的圖像和聲音展現在人的面前，這樣，感官的興奮就滯留在感知的最低階段，即聽和看。也就是說，圖像和聲音不再進入意識深層，而只是活躍在感官層面上。在這一層面上，「今天攝取事物內蘊的模式已既不是希臘傳統意義上的『視』，也不是猶太教或基督教傳統意義上的『聽』，而是『吃』。我們蛻變成『工業口淫人』」⑧，對於所謂的工業文化不經咀嚼、囫圇吞棗，這導致人類無可挽救的幼稚化。

人類無可挽救的幼稚化還表現在人的自由已成了一種困境。生活在工業文明下的人，習慣於在工作中被支配，一旦在工作之餘要他支配自己，就無法勝任了。人們不知道如何去填充業餘時間，業餘時間成了無所事事的代名詞。業餘時間不再意味着獨立和自由，反而引發了種種懼怕。於是在「失」業的那時那刻起，人們不可能，也不會去尋找自我，而是慌不迭地要尋找一種充斥所有感官的東西來支配自己，電視似乎集緊張和輕鬆、高速和閒散、歷史和現時於一身，便自然而然成了最佳的消費品。人們容不得自己有片刻的喘息，就像癡君子似的得一支接一支不停地往下抽。這種「飽食終日」並非人在展現自己支配自由的能力，而恰恰是一種「困獸猶鬥」的恐慌。安德斯把這視為「人為的精神分裂」，其特徵就是把

電視將世界「運進家門」之後，電視觀眾和這個運進家門的世界之間就失去了應該存在的距離。人已不再去尋找世界，而是世界向人走來。人與他所在的世界之關係通過電視簡單化了、幼稚化了。

自我分割成兩個或更多的組成部分。這些組成部分不僅不協調，而且無法協調，更核心的是自我拒絕協調。一般的文化理論家在講到人的異化時，都着眼於人異化成了系列產品，而安德斯指出，當今的人已經不僅成了系列產品，而是成了系列多功能產品，帶着所謂「全面發展」的面具，卻擺脫不了支離破碎的本質。

〈幻象和複製的世界〉是安德斯對大眾媒介批判的重要學術貢獻。作為思想家，他對現代大眾媒介的批評是激進的：作為哲學家，他的世界觀是悲觀的，他的方法論是誇張的。他曾經說過，當人們在麻木中昏沉時，不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他們是聽不見的，不用顯微鏡的方法是無法從生活的微觀世界中得出真知的。他對現代大眾媒介的批判也是遵循了這個基本原則，他也承認是抱着只看病、不救人的觀點來針砭時弊的。或許救人也是不現實的，因為「作為存在物，我們已被判處只能被動地接受幻象世界，而不能認知真實世界。我們中間有些人已經不再要求另外形式的自由選擇，更有一些已經不會對此進行思考，這已經成為事實」^⑨。如果有人認為人們最終有關掉電視機或者不去買電視機的自由，從而可以面對真實世界的話，那麼這樣的想法同樣是幼稚可笑的，因為「拒絕電視機的人受到的灌輸並沒有比電視消費者少。我們的參與和不參與一樣，我們在參與，因為我們被驅迫參與。這跟我們想參與和不想參與無關，我們生活着的人類社會已經不再是『世界』和經驗世界，而是幻

象世界和幻象的消費世界，這已不是我們的拒絕能改變的，這個幻象世界和我們亦步亦趨，要拒絕它是不可能的」^⑩。

註釋

①②④⑨⑩ Güther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Über die Seele im Zeitalter 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1988), pp. 70; 157; 164; 1; 1.

③ Marshall McLuhan: *Wohin Steuert die Welt. Massenmedien und Gesellschaftsstruktur* (München, 1978).

⑤ 錢鍾書：《管錐編》，卷一，頁5。

⑥ 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店，1987），頁40以下。

⑦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 zur Sprache* (Stuttgart, 1992), p. 59ff.

⑧ Konrad Paul Liessmann: *Güther Anders.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1993), p. 67.

我們生活着的人類社會已經不再是「世界」和經驗世界，而是幻象世界和幻象的消費世界，這已不是我們的拒絕能改變的，這個幻象世界和我們亦步亦趨，要拒絕它是不可能的。

范捷平 1955年出生於浙江杭州，現為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日耳曼文學及理論、教育學博士候選人。曾發表〈京特·安德斯與他的批判理論〉、〈飄浮的大象〉等中文、德文論文多篇，主要譯作有《中國前衛藝術》、《過時的人·導論》等。

徐艷 1965年出生於浙江杭州，現為柏林工業大學語言中心德文教師。